

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 评介与思考^①

刘谢慈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之强制性源于美国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只要符合强制合并程序的启动条件,法院都应当充分利用程序手段将某一案外人纳入一个已经启动的诉讼,这与美国民事法律中衡平法的盛行息息相关。虽然从表面上看,强制合并是对当事人处分原则的一种背离,实际是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行使方式的引导,在这一过程中,引导尺度和时机是最为关键的要素。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民事司法系统一直试图通过程序法上的调整来整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简化诉讼运行过程,这不但有利于法官全面理清案情,方便后续审理,也对提高案件审理效率,减少重复诉讼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当事人;强制合并;权益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3-0113-07

当事人强制合并是指诉讼中数个原告或被告必须同时起诉或应诉,否则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追加将其合并到同一诉讼中审理的诉讼程序,若被追加的当事人拒绝被合并,法官有可能直接驳回诉讼,其现实动因在于尽可能避免诉讼的不当终结。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a)款的具体规定:“如果某一当事人原本就在法院传唤文书指定的范围之内,而且将此人合并到诉讼中不会影响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那么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将该当事人合并:(1)已经参加到本诉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公平处理结果受该当事人的影响;(2)被合并人的诉讼请求与本诉的诉因有直接联系,并且他的缺席很有可能导致下列事项的发生:1)有损被合并人自身的救济权利;2)其他已经参加到诉讼中的当事人可能遭受实体权益风险,或者可能导致其在先前程序中所主张的诉因与真实诉因不一致。”^①历史上曾将当事人强制合并细分为“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合并”和“必要的当事人合并”,不适用前者将直接导致诉讼终结,而后者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被合并,其排除适用并不必然导致程序终结。为了简化繁琐的诉讼

程序,1966年修订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彻底将前两种合并方式简化为一种,统称“当事人强制合并”,并沿用至今^②。修订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在摒弃原有“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和“必要当事人”的基础上,将特定情形下某一当事人缺席可能引发的不利诉讼后果作为判定是否允许合并的重要准则^③。如果由于不同司法辖区法律适用或管辖权问题导致合并事项受阻,进而影响案件进展,法院可以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b)款以衡平法的考量标准裁定是否对案件继续审理,具体包括:(1)强制合并人缺席下的法院判决可能对此人或者其他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造成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2)是否可以引用如下法律条款降低或有效避免不利后果:1)判决书中列明的保护性条款;2)是否能够找到其它正当且有效的救济手段;3)法院认为合适的其他正当条件;(3)强制合并人缺席状态下的判决于法律逻辑上是否公平合理;(4)若强制合并人的缺席导致原诉的直接撤销,原告寻求其他救济方式的路径是否畅通^④。

① 收稿日期:2017-11-25

作者简介:刘谢慈(1990-),男,湖南益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①Health v. Aspen Skiing Corp, 325 F. Supp 223, 229, D. Colo, 1971.

②Schilken, ZivilProzessrecht, 4. Auflage 2002, Heymanns Verlag KG.K.

③John Bartlett. *Familiar Quotations* 348. Emily Morison Beck ed., Little, Brown & Co, 1980.

④Deborah E. Larbaletstriei, *Paraleg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A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Legal Assistant*, Prentice Hall Press, 1994.

一 “强制性”在法律逻辑上的合理性分析

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强制性和必要性源于美国民事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在案件审理程序中,某些案外人可能是法院公正处理案件、判定权利义务归属的必要主体。由此可见,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实现广泛的司法正义,司法机关的每一个判决都应在最大限度内维护所有“诉讼关联主体”的正当权益。除了对强制合并人权利的积极维护,强制合并规则实际上对已经处于本诉中的其他当事人和其他可能有关联但还未被正式确定诉讼地位的缺席诉讼人具有重要意义,其存在可以有效避免恶意诉讼和重复诉讼对程序效益的无端伤害,减少诉讼成本的浪费。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b)款的开头即写明“本着对良心和衡平法原则的考量”,这一表述清晰印证了诉讼实体正义在决定“当事人合并与否,即使可能会导致诉讼程序的暂时停滞……”这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①。处于不同诉讼地位的当事人基于自身权益在诉讼中的优先性而被纳入诉讼统一进程,符合强制合并条件的当事人必然与已经处于诉讼进程中的当事人具有相关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关联的强度是明显大于一般的选择性合并,其缺席不仅对诉讼整体产生消极影响,也会使自身权利受损。所以,法律条文中“特定情况”之措辞是对被强制合并人缺席状态下不利诉讼后果^②之综合表述^③。

在 *Provident Tradesmens Bank*^④ 一案的判词中,联邦最高法院解释了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重新修订的必要性,它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第三巡回审判庭的裁决,在以往的案件审判中,法院往往遵循第三巡回审判庭先前作出的判例主旨即“可能与本诉具有牵连并受到其影响的潜在诉讼人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审判”。同时,联邦上诉法院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判例直接援引为正式法律依据^⑤。

当某一当事人坚持要求合并纳入一位新的当事人时,会出现一个宪法上的潜在问题。例如,在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财产充公一案中,当事人的主张涉及不同州法间的冲突,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若对本诉争议标的物主张权利的其他当事人最终没有参加本诉审理,由此导致本诉被告有可能承担原本不应该承担的多重责任,那么本诉即应终止。同时,若将对本诉标的的权利的诉讼人选择性的分开单独审理,并且在此情况下被告可能将重复清偿某一既定债务,那么这就属于“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剥夺^⑥。虽然上述案件的最终裁决没有适用于数个当事人对同一诉讼标的物主张权利的请求,但仅从法律逻辑的角度看,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法院应当限制合并机制的适用范围以使其免于适用于后一场景^⑦。当不可或缺的当事人无法参与合并程序时立即终结本诉审理的做法与法院力求最大限度解决当事人争议的初衷明显背离,特别是在终止诉讼或将导致某一权利本已受损的当事人无法寻求救济时,这样的冲突就显得更加激烈,类似情况在其他类别的当事人合并程序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出现。

实际上,无论是当事人合并还是诉讼请求合并,美国民事诉讼中诉讼合并机制的主要目标就在于通过尽可能简捷的诉讼程序在同样的时间里满足所有关联当事人的诉求,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双重正义^⑧。然而,法院在启动当事人强制合并程序时所需要处理的事项可能与程序的基础目标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比如合并裁定有时会给现有诉讼当事人带来诉讼效率上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损害被合并当事人的救济选择权益。此外,本诉法院对“潜在合并当事人”的司法管辖权限同样值得探讨,它不能仅从现有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作出判断,法院必须考虑到合并裁定和最终判决对全案当事人以及未参加诉讼但符合选择性合并条件的当事人所造成的后续影响。不管胜诉还是败诉,对于那些与诉讼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的潜在当事人而言,审判法院都无法事先直接决定其终局判决的拘束力。但是,通过考察大量指导性判例可以得出,先前的法院判

①Reed, Compulsory Joinder of Parties in the Civil Actions, 55 Mich. L. Rev. 1957, 55(327): 356.

②包括诉讼迟延、诉讼成本浪费以及诉讼主体将承受的不利后果等。

③Bevan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 Inc., 293F. Supp. 1366, 1369(S. D. N. Y. 1968).

④390 U. S. 102, 88 S. Ct. 733, 19L. Ed. 2d 936(1968).

⑤Russell v. Clark's Executors, 11 U. S. (7 Cranch) 69, 3L. Ed. 271(1812).

⑥368 U. S. at 76, 77, 82S. Ct. at 202.

⑦参加下列材料对此问题的讨论,但是其并未作出最后判断:Hunt v. Nevada State Bank, 285 Minn. 77, 90, 172N. W. 2d 292, 300(1969),要求调阅案卷的上诉申请被法院驳回 397U.S.1010。同时参见 Kaplan, Continuing Work of the Civil Committee: 1966 Amendments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Harv. L. Rev. 1967, 81(1): 356-368.

⑧Freer, Avoiding Duplicative Litigation: Rethinking Plaintiff Autonomy and the Court's Role in Defining the Litigative Unit, U. Pitt. L. Rev. 1989, 50(18): 809.

决仍然会因心理暗示效应(effect of hint)而对缺席诉讼人后续的诉讼程序选择以及答辩权产生消极影响^①。

现代美国民事司法系统中当事人强制合并的法律逻辑表明,恰当适用程序机制既可以将司法资源效用最大化,其必要的灵活性和适时的变通性也恰好印证了民事诉讼结构中法院对各方权益冲突的谨慎而有效的平衡。

二 “强制性”综合评估的核心问题

法院在裁定是否应该适用强制合并程序将某一缺席当事人纳入本诉审理时,必须全面评估该缺席诉讼人对各诉讼主体之法律权益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其在本诉中可期待救济权利的优先等级和现实状态。这样的综合评估可以拆分为三个具体问题:第一,现有诉讼当事人主要指本诉原告,在其缺席状态下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救济?第二,缺席当事人在未参加本诉审理的情况下是否会影响其自身对本诉争议焦点的权利主张?第三,若将该诉讼人另案处理,现有诉讼当事人主要是被告是否会因此承担相互矛盾的责任或者重复责任?若法官对上述任意一个问题作出肯定答复,那么该缺席诉讼人就应该被合并纳入本诉程序。可以看出,法院对“强制性”的判断标准总的来说是围绕“未裁定强制合并将使何人遭致何种损失”来分步考虑的^②。下面,笔者将就这三个核心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对本诉原告权利救济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若现有诉讼当事人在“待合并案外人”缺席时不能获得充分的救济,那么就必须通过强制合并程序将其纳入本诉审理中。这一标准是为了让权利受损之人的救济之路不被阻塞,从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关联请求或者申诉进行统一审理,进而提高司法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比如,被保险人在一起车祸中将他人撞伤,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赔偿,受害人将非案件当事人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第三者保险责任。此时,若保险合同一开始就写明只在特定金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那么在此范围之外的判决将对被害人没有任何意义,这时,案件当事人就可能基于“实质相同的事实”而再次向被保险人起诉,这样就无端浪费了司法资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法院在受害人起诉伊始就应该启动强制合并程序,将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并入诉讼之中^③。

(二)对强制合并人权利救济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问题,若不适用合并程序将损害潜在的强制合并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权益,就必须对其进行合并,这是为了避免某些缺席诉讼的当事人遭受终局判决既判力的影响。该问题的核心要素在于理清非诉讼当事人在不适用合并程序的情况将在哪些方面受到侵害,包括具体涉及到权益类型以及受到侵害程度。这样的分类方式就要求法院在合并可能发生之时就对各种可估计的诉讼结果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既包括本诉程序的承接,也包括后续救济手段的可行性分析。Provident Tradesmens Bank & Trust v. Patterson 案件的审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书中表达的观点重申了先前程序实效考察对合并程序适用的参考性,尤其是在采用强制合并标准时,未合并给非诉讼人带来的损害程度需要紧密结合先前程序以作出关联性判断。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初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责任援用一切可能的程序避免司法权力对现有当事人和其他潜在关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实际损害。比如,若某个案外人与一份一次性偿付的保险合同具有可推测的利害关系,则必须对其合并,其法律逻辑在于,即便该案外人的权益暂时不会受到后续排除规则的影响,但诉讼中存在的保险合同是其唯一的求偿来源,此时的判决将直接分配合同中约定的保险金,若不参加诉讼,可能使其今后承受无法被偿付的风险。

(三)对本诉被告责任承担的影响

这一问题的考量同样是为了避免现有诉讼当事人权益受损,但其更多指向诉讼终结时的终局影响。在该问题的审查中,司法机关必须确定对现有诉讼当事人(主要是被告)的损害程度以及损害发生的概率才能裁定是否适用强制合并程序^④。对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a)款规定,当事人必须面临“承担双重、多重或者不一致责任的实质风险”,但在某些情况下,只要存在危及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可能性,也被视为足以达到要求。可见当前法律文本中尚无法找到对判断标准具体确切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来探寻法官审查问题的标准边界。例如,一家企业的工会组织为了在集体劳动合同中争取到有利于己的申诉、仲裁等纠纷解决条款而将雇主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定,原被告间的争议实

^①Haas v. Jefferson National Bank of Miami Beach, 442F. 2d 394(5th Cir. 1971).

^②7 C. Wright, A. Miller&M.Kane, Civil 2d 1601-04.

^③Prestebach v. Employer's Ins. Companies, 47 F.R.D.163(E.D.La.1969).

^④Window Glass Cutters League of American AFL-CIO v. American St. Gobain Corp, 47 F.R.D.225, 258(W.D.Pa.1969).

质是“工会之间对不同权利的要求和意见”^①。若法院不采取措施将另一个工会合并处理,则雇主很有可能在本诉结束之后再次面临被诉风险,而且另一工会提出的诉求将很大程度上与本诉原告类似,他们的意见都是基于集体劳动合同而产生。因此,法院判令将另一未起诉的工会进行合并,在本诉中统一处理。在另一起“哈斯诉国家银行”案中^②,哈斯因股权转让问题起诉银行,其声称与另一股东阿尔维克一起购买了全部股份,并要求银行在接到阿尔维克的申请后发售等额的相当于哈斯二分之一所有权的股票。而实际上,银行后来将所有股份以阿尔维克的名义进行了发行活动。法院经审理认为,若阿尔维克不参与本诉的审理就肯定不受判决的约束,那么他可能在随后的诉讼中再次将银行列为被告,主张对发行股份,也即全部股份的所有权。此时,由于阿尔维克的缺席会致使国家银行遭受重复法律责任的风险(本诉二分之一股份与后诉全部股份重叠),所以法院裁定将阿尔维克合并到本诉中一同审理。

总的来说,只要法院认为对案外当事人的合并是可行且必须的,本诉中请求合并的现有当事人都会被赋予机会向案外人传达合并意愿。大多数情况下,案外人会考虑自身权益实现的几率而参与到诉讼中,只有当案外人故意抗拒法院指令且符合法定条件时法院才会裁定终止全案审理,这是所有诉讼参与者最后的无奈之选。

三 法院权力框架与“强制性”边界的冲突与统一

(一) 法院权力定位与诉讼主体之权益协调

在判断某一案外人是否符合强制合并条件的过程中,法官必须针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b)款和其他州司法辖区的既定规则共同勾画的“四步标准”为其权力行使限度划定了基本范围^③。然而,这看似精确的标准其实也会只是为法官提供总体方向上的参考,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法官需要考虑的事项绝不能一概而论。另外,四步标准在独立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往往还需要综合考虑相互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不仅包括各标准之间的相互印证,也包括其与案件事实的逻辑合理性。法律规则并没有强调某条标准的独特地位,法官需要在综合考

虑各项标准的情况下根据衡平法原则和良知意识作出最终决定^④。

从标准的第一步来看,当前施行的规则要求法院在判断某案外人是否属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时必须查明“某人的缺席是否会导致其自身和现有诉讼当事人权益受损。”就像笔者在上文提到的那样,法院所做的每一个合并裁定都是为了预防损害。当法院裁定将不可或缺当事人合并处理时,他必须考虑到其它连带状况的发生,此外,当事人寻求后续诉讼的救济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正如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审判庭所声明:“当法院适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时,法官既不能过分推测判决的侵害范围,也不能轻视判决对诉讼各方的影响。”对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用“现实性”和“效用性”来表达这一判断原则的主旨^⑤。

从标准的第二步来看,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若合并程序的适用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法院是否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手段消除影响或者将不良影响限制在可控范围。”这一条是法院司法主动性(judicial initiative)的鲜明体现,也表明了强制合并对法官灵活变通程序手段的迫切需要,具体的选择方向受到具体案件特征的限制。从各地法官的实践经验来看,法官可以合理变动判决书的内容来尽可能保护未参与诉讼的关联诉讼主体。为了避免给缺席诉讼的诉讼主体造成损害,当事人可以主动或者由法院在各当事人之间做一些法庭外的非正式会见并提醒他们择时运用一些具有“侵害预防性”的程序措施,主要包括,将缺席诉讼人并入被告的反请求之中,或者提起防御性的竞合确权诉讼以合法引入缺席诉讼人等等^⑥。另外,对于那些法院依法暂时不能采取强制合并的缺席诉讼人,若他的缺席依据合理推测将很有可能对自己或现有诉讼人之权益造成损害,那么法院可以赋予他放弃阻碍条款并自愿加入本诉审理的机会,此时,缺席诉讼人可能需要声明放弃自身对属人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异议^⑦。当法官遭遇“是否会对抗拒合并指令的缺席诉讼人造成实质损害”这一问题时,上述程序选择将具有重要意义。

从标准的第三步来看,法官需要判断在某一当事人缺席状态下所作的判决对于争议权益的最

①47 F.R.D.at 256.

②442 F.2d 394(5th Cir. 1971).

③Oxley v. Mine&Smelter Supply Co,439P.2d 661(Wyo.1968).

④Fisk: Indispensable Parties and the Proposed Amendment to Federal Rule 19, Yale L.J,1965,74(403): 424.

⑤Schutten v. Shell Oil Co, 421F. 2d 869, 874(5th Cir. 1970).

⑥Associated Dry Goods Corp. v. Towers Financial Corp, 920 F. 2d 1121(2d Cir. 1990).

⑦Sandobal v. Armour & Co, 429 F. 2d 249(8th Cir. 1970).

终分配和所有关联诉讼主体的后续程序选择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要求法院理清诉讼中各阶段的关联问题。法院必须在全面考虑当事人请求的前提下,思考如何解决案外人的救济请求,以使得后续诉讼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不仅需要法官对关联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属性进行准确性,也牵涉到判决书的措辞^①。例如,在一起案件的审理中,由于法院不能依照州法将所有与诉讼争点相关的被告同时纳入本诉,进而也就不能直接判决支持原告提出的“要求公司宣告股息”的请求,但是法官为了间接保证原告请求效果的实现,发出令状要求对公司的资产暂时进行扣押^②。

对于标准的最后一步,法官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原告提起的诉讼因为强制合并人的缺席而被裁定驳回,原告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将受到何种损害。若原告在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由于强制合并程序的失败而被驳回,他一般会选择在其他州法院重新起诉。所以,联邦主审法官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案件在州法院接受管辖的可能性。对州法院的后续管辖产生阻碍的因素一般包括诉讼时效和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另外,案件本身的性质也可能对州法院的管辖权产生影响,例如,在一起联邦法院管辖的案件中,法官经审查认为,若案件由某一州法院管辖,那么所有信托受益人都必须被合并纳入此信托诉讼,由于信托涉及范围太广,而州法院的调查能力有限,所以案件实际上无法由州法院行使管辖权,因为这会给司法系统造成“无法等量匹配的沉重负担”。所以,联邦法官最终裁定继续审理此案^③。

(二) 司法主动性的必要张力与适时收缩

若案外人民事权益与本诉标的紧密相关并因此符合成为原告的条件,但其本人并不愿意以此身份加入诉讼,那么法院可以依据法定的对人管辖权以令状的方式指令他作为被告参加本诉。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涉及专利权以及版权纠纷诉讼时,非诉讼当事人可以作为非自愿原告被合并。由于专利法和版权法均规定,如果未将专利所有权人或者版权所有人并入诉讼之中,排他性被许可人就不能因侵权而提起诉讼,所以必须适用合并程序^④。在法院管辖范围之外的所有权人将以非自愿原告的身份被合并,而在法院管辖范围之内所有权人可以作为非自愿被告被

合并^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以被告身份加入诉讼后,法院可以将其身份重新调整为原告,这种调整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该诉讼中的当事人具有不同的州籍或者国籍时,这种变动往往有利于维持联邦法院的固定管辖权。但是,若这一被强制合并的当事人除了自身意愿之外还因为权益的特殊属性而与本诉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对立关系,那么法院就不会对其作出“被告转原告”的调整。例如,公司的某一个人股东怀疑总经理的不当行为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进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因而向总经理提起派生诉讼,要求赔偿相应损失。由于诉讼显然关系到公司的利益,所以公司主体当然属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然而,本诉中的特殊关系在于不可或缺的当事人处在现有被告,即总经理的管理和控制之下,而其基于控制权完全有能力反对原告的派生诉讼,因此,若公司在非自愿的状态下以被告身份被并入诉讼,法院就不应该主动对其身份进行调整^⑥。

法院司法主动性的适用范围一般仅限于初审和上诉审阶段,并且上诉审阶段会涉及更多问题。在法院以“不能合并”为由驳回当事人起诉的多数案例中,核心原因并不是对权利义务分配产生争议等实质性问题,而且初次的驳回并不会影响以后就相同问题再次起诉。从性质上看,未合并所造成的错误不属于司法管辖上的问题,通说认为这属于衡平法上的瑕疵^⑦。此外,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法院可能无法通过令状的方式合并非诉讼当事人:第一,法院的事物管辖权因合并而失效;第二,法院对主动请求被合并的当事人不具有对人管辖权;第三,非诉讼当事人虽然希望合并参与本诉审理,但对现有法院的地域管辖提出了合理的异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十九条(b)款规定,在这三种情况下,法院需要本着“衡平法原则和良知意识”来决定是否在必当事人缺席的状态下继续审理案件^⑧。若法院经审查发现若继续诉讼肯定将侵害现有诉讼当事人和该案外人的权益,那么该案外人就可能被法院判定为必须合并的当事人。

(三) 当事人程序救济机制与法院权力的协调

若任一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不予合并裁定不

①The 1966 Advisory Committee Note to Rule 19, reprinted in 39 F.R.D.89,93(1966).

②Kroese v. General Steel Castings Corps, 179F. 2d 760(3d Cir. 1950).

③Rippey v. Denver U.S.Nat. Bank, 260F. Supp. 704, 711-12(D.Colo.1966).

④Waterman v. Mackenzie, 138 U.S. 252, 11 S. Ct. 334, 34L. Ed. 923(1891).

⑤Independent Wireless Telegraph Co. v. Radio Corp. of America, 269 U.S.459, 46 S. Ct.166, 70L. Ed. 357(1926).

⑥Ross v. Bernhard, 396 U.S.531, 538, 90 S. Ct 733, 738, 24 L.Ed.2d 729(1970).

⑦Swift v. Boonslish Sav.&Loan Ass'n, 78F.R.D.342(W.D.Mo.1978).

⑧Shields v. Barrow, 58U.S.(17 How.) 130, 15L.Ed.158(1855).

服,他都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提出异议。一般来说,异议需要在提交答辩状之前的申请动议程序(pre-answer motion)或者答辩状中提出。当事人所享有的这种异议权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异议程序所规定的保驾护航条款,“当事人对于不予合并的异议可以在任意时间提出,同时这种异议的权利不会因为诉讼的迟延或者中断而被剥夺”^①。但是,异议的提出并非毫无限制,异议申请提出的时间需要与法律作出不合并裁定的理由结合起来考虑,这关涉到异议申请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比如,在一起案件的审理中,某一当事人为了防止将来受到缺席诉讼人提起的新诉的困扰,对不予合并的裁定提出异议,此时,他的利益出发点只是自己预期的权益保护,无关缺席者本人在本诉中的利益损失。此时,法院可以综合考虑其异议理由进而权衡缺席者和申请人的权益,若其故意延迟申请提出的时间,异议申请很有可能将遭到法院的拒绝^②。

在异议程序中,最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因素的相互制约:一是不予合并将给申请人在本诉中的诉求造成何种影响,二是不予合并对诉讼效率和诉讼成本的影响^③。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司法机构对于诉讼效率和公平的要求会迫使主审法官考虑异议背后的实质问题,除了内心确认以外,法律逻辑的合理推演和关联主体权益损害是法官必须优先确定的关键问题。若初审判决并没有损害缺席诉讼人的利益,或者异议申请是在上诉审阶段首次被提出,那么异议申请将很有可能遭到否定,因为法官此时有足够理由确认“不予合并的裁定”没有影响“初审中对实质争议问题的判决”^④。

四 我国相关制度的观念消解与重塑

从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主体合并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共同诉讼和第三人诉讼中。制度规则本身的欠缺和实际执行中的变形引发了一系列难题,比如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导致的矛盾判决,判断标准不明导致的双重诉讼,混淆必要共同诉讼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这些棘手的现实困境既对我国民事诉讼的正常运行带来挑战,也为相关程序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一) 处分原则之变通性

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是与当事人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为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进程中的意思自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根据处分原则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诉讼对象应完全由原告选择,但如果已经成立的诉讼明显关乎案外人利益,法院就有必要启动强制合并程序。这既是对现有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手段,也是对可能产生的消极诉讼后果的预防措施。在笔者看来,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对处分原则的一种背离,但实际上是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行使方式和具体适用场景的综合引导,是国家权力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适度干预,在这一过程中,引导的尺度和时机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的指导下,重复诉讼所带来的矛盾判决以及被告承担重复责任的风险都被降至最低。在这种情况下,若一味强调处分原则而拒绝强制合并必然是僵化且不合理的,因为原告之民事实体权益并没有因为强制合并的适用而丧失,其程序处分权上的变动也只是为了更顺畅的实现诉讼整体之救济利益。

(二) 程序法与实体法之相适性

美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存在大量与程序法配套的成文法,并为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英美法系中开放式的民事诉讼程序结构,我国有学者一直以来都以不同法系的历史背景为由加以隔绝,比如台湾学者陈宗荣在“关于第三人参与诉讼之研讨会”上就提出:“在成文法体系中的诉讼制度必然是我们现行法这一套东西。如果像英美法之实体法没有成文法的情形下,诉讼制度无形中便可以创新。……由于背景不同,是值得思考的。所以,个人认为,不能说英美法的制度我们认为很好,便一定要将之成文化,而是配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做。不能说,实体法没有动,程序法先跑在前头,弄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本末倒置。”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对于传统、固有差异和既定程序之间的连接显得有些偏执。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发展并无绝对的先后顺位要求,而其各自具有的独特属性也注定了它们之间一一对应的模式暂时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即便实体法已经确定,也并不意味着程序法革新的停滞。比如民事诉讼由过去单纯的原被告对立

① Fed. Civ. Proc. Rule 12(h)(2).

② Provident Tradesmens Bank & Trust Co. v. Patterson, 390 U.S. 102, 110, 88 S.Ct. 733, 738, 19 L. Ed. 2d 936 (1968).

③ The Advisory Committee Note to the 1966 Amendment to Rule 19, 39 F.R.D. 89, 93 (1966).

④ Judge Hutcheson's dissent in Calcote v. Texas Pacific Coal & Oil Co., 157 F. 2d 216, 224 (5th Cir. 1946), 同时,该案中要求调查案卷的上诉申请被法官驳回 329 U.S. 782.

的双方模式向第三人诉讼的转变就是程序法突破实体法固有范围的典型。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合并规则也并非与生俱来,它在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断演变,反映并论证了不同时代对创新民事程序规则的内在要求。

(三) 实用主义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延展

美国司法系统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繁琐的民事程序规定,力求通过程序法上的引导来重新整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进而简化诉讼的运行过程,它不但有利于法官全面理清案情,方便后续审理,也确实提高了案件的处理效率,减少了重复诉讼的发生。从两大法系的传统上看,美国的民事诉讼规则一直通过扩大其实用性来提高其解决纠纷的能力^①,诉讼的任一阶段都可能出现具有“终局效力”的纠纷解决方案,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交互诉讼以及互争确权诉讼等都是“实用性”的典型代表。相较之下,深植大陆法系的中国民事法律规则显得有些保守,民事诉讼中的强制合并大多只是基于实体法对权利义务的考量。

美国各级法院在各类型纠纷中都会积极鼓励当事人合并规则的适用,只有在确实有碍诉讼进行,案件处理成本过高等与程序初衷背离的少数

情况下,法院才会裁定不批准当事人的合并请求,并建议其另行起诉。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意义在于法院基于诉讼成本、诉讼效率以及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等问题的考量,有必要在符合当事人平等公平理念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单次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范围,并经由诉因制度,当事人制度以及救济机制等适当而充分地拓展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的互通途径。

当前我国民事审判改革在调整法院权限的同时正试图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某些优点,虽然我国没有与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强制合并”完全对应的概念,但诸如共同诉讼、第三人诉讼等相关程序规则都可以适度承载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本质功能。在具体分析制度运行土壤及其配套措施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适度参考当事人强制合并制度的内在价值与相关规则,明确法律逻辑对行为事实、合并请求的限定性,并结合具体的法律条款提出相应的救济请求。法院在充分考虑当事人诉求的基础上,应该合理利用程序手段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引导,在不脱离基本事实和法律条款的前提下,对其诉求予以适度调整,以实现各方当事人程序权益和救济利益的最大化。

On Compulsory Combination System of Litigants in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Law: Reviews and Reflections

LIU Xie-ci

(School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compulsion of compulsory combination system of the parties has been originat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American Civil Law. As long as it meets the starting conditions of the compulsory combination procedure, the court shall make full use of the procedural measures to incorporate an outsider into an existing lawsui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equity in American Civil Law. Superficially, compulsory combination is a kind of devi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party's disposition, but in fact it is the guidance of the court's action o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In this process, the scale and timing of guidance are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s.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American civil judicial system has tried to integ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through procedural guidance, thus simplifying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 It not only helps the judge to sort out the case in detail and to facilitate the subsequent trial, but also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se and reduces the occurrence of repeated litigation.

Key words: litigant; compulsory combination; legal right

(责任校对 李云霖,谢宜辰)

^①陈杭平:《“纠众事件”:美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探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